

洛特曼与巴赫金

赵晓彬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莫斯科 - 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先驱洛特曼与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巴赫金的对比, 诠释洛特曼和巴赫金在世界观 (主要是宗教和哲学思想) 和符号学理论 (主要阐述二者符号学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时空”论和“对话”论两个方面) 研究上的差别, 探讨洛特曼符号学派对巴赫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相通性。

关键词 宗教思想 结构主义 符号学 时空体 对话理论

洛特曼和巴赫金的名字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并不陌生, 前者是莫斯科 - 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创始人, 世界最知名的符号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 后者是前苏联著名的思想家、文论家和语言学家。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俄国, 研究巴赫金的文献常常都要提到莫斯科 - 塔尔图符号学派以及洛特曼的名字, 而在关于洛特曼的研究文献中, 巴赫金的名字也屡见不鲜。把这两位生活在不同年代、学术领域不完全相同的学者如此频繁地联系在一起, 并且习惯性地对两位学者的学术观点进行相互对照和比较, 必有其因。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巴赫金和洛特曼这两位大学者的学术差异以及洛特曼对巴赫金的继承。

关于巴赫金与洛特曼, 俄罗斯从 70 年代开始就发表过一些文章, 论述巴赫金的符号、话语和对话理论在当代符号学中的意

义, 讨论巴赫金与洛特曼在学术上的相互关系, 最近几年西方甚至出现了大量以“巴赫金与洛特曼”为篇名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对巴赫金和洛特曼进行了对比研究, 认为巴赫金和洛特曼符号学派都从广义的符号角度研究符号意义和功能, 他们所着眼的不仅是语言系统, 而且是任何一种符号系统。这些论文所侧重的角度各有不同, 有的注意到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差异, 把洛特曼早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与巴赫金的理论相对比; 有的则强调巴赫金批判洛特曼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的方面, 认为巴赫金理论确定了符号学的社会性质, 与建立在索绪尔学说之上的洛特曼符号学相对立; 有的也指出了巴赫金对洛特曼的影响等等。密切关注巴赫金与洛特曼关系问题的还有洛特曼的挚友、同仁——叶高罗夫。叶高罗夫还写有《巴赫金——对他的继承以及符号学的现实问题》

(1983年他在德国耶纳习勒大学召开的巴赫金国际讨论会上做的报告)一文,说明了洛特曼符号学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相互关系、洛特曼与巴赫金的世界观的区别以及二人之间的交往等问题。叶高罗夫的论著对我们探讨洛特曼符号学派与巴赫金理论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认为,首先,不能仅从某一方面判断巴赫金与洛特曼的不同。巴赫金与洛特曼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学者。巴赫金是社会学家,又是历史文化学家,而他又称自己为“哲学人类学家”,他还被语言符号学家们所推崇,他的语言学思想是从超语言学角度研究符号的人文性、社会性;洛特曼也不是纯粹的语言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艺术学、文化学和哲学,但洛特曼关注的焦点是符号学,他是60年代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学派的代表,在80年代以后才继承和发展了巴赫金对人文符号的研究方法。巴赫金对洛特曼的批评只是针对洛特曼的早期创作,他在70年代并没能全面地了解洛特曼学说的发展和后期的符号学理论。洛特曼后来的文化符号学与巴赫金思想有些接近,但二者却有着根本差别;洛特曼受过巴赫金的影响,但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符号学方法。

其次,普通的符号学原则不能完全涵盖一个学者复杂的世界观体系,而世界观体系往往支配着学者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正是世界观问题,过去研究“巴赫金和洛特曼”的作者很少涉及。所以,我们在研究巴赫金和洛特曼的相互关系的时候,要力争从世界观差异的角度来探索他们的不同,探讨二者在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上的差别及符号学理论上的异同。

一、世界观(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分野

巴赫金终身信仰宗教,在大学期间受到

过德国哲学和俄国东正教的影响,他的哲学、伦理学思想都有宗教的痕迹,如他研究果戈里的“笑”、“讽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狂欢”等问题时所着眼的就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传统民间文化和宗教文化,他的文艺美学思想与宗教伦理是密切相关的。但巴赫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基督教徒,他与官方教会和保守的传统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神话传说和仪式中的“酒神文化”和“笑文化”十分青睐,开拓了小说的“复调”结构和“狂欢化”诗学理论。宗教思想一直是巴赫金世界观的基础。他正是在宗教的王国里建立起了他的美学、伦理学,“罪孽”、“献身”、“赎罪”、“神赐”一类的概念在他的著作里随处可见。可以说,巴赫金的世界观本身就是“狂欢”型的世界观。

巴赫金是在康德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很早便开始读德文原版的哲学著作,除了康德的著作以外,他还阅读康德派哲学家们的著作。康德的哲学理论在巴赫金的学术研究和大学讲学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与挚友——曾经在德国学习过的俄国哲学家 . . . 卡甘一起举办过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小组;他也强调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尤其是马堡学派的领袖 . 柯亨及柯亨的学生 . 纳托尔普对他的影响甚大,认为新康德主义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依据新康德主义原则分析道德问题,强调伦理学在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提出了“同一”、“行为”、“责任”等伦理学概念。此外,他还将人物的个性化因素推到首位,指出文学作品中主客体范围的相互作用,赋予了问与答以创造性的认知。而且,巴赫金不赞同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观点,指责形式主义诗学只注重语言的结构和形式,忽视其文化历史、艺术的内容。所以,巴赫金

的美学和文艺学著作实际上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哲学思想。

而与巴赫金不同，洛特曼始终是一个无神论者。洛特曼是在 30—40 年代列宁格勒的学府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的老师所接受的思想都是黑格尔及发源于黑格尔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历史主义的热情和辩证法思想都渗透到了年轻的洛特曼的世界观中，他的许多结构主义理论观点都是依据辩证法哲学思想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对洛特曼起到积极教育作用的始终是深深地渗透于 19 世纪俄罗斯社会和思想界的黑格尔哲学，而不是黑格尔之前的康德学说。不过，洛特曼的确注意到了 20 世纪出现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想。为此，洛特曼的儿子小洛特曼曾试图把父亲也列入康德学派这一阵营，并认为“洛特曼是一位康德学派的信徒”，后来小洛特曼还依据父亲的《文化是主体又是客体》一文，认为洛特曼从 1989 年便放弃了黑格尔的传统而走向了新康德主义。^⑩但是，与洛特曼共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叶高罗夫则不赞同这种说法。叶高罗夫认为，洛特曼的确多次提到过康德，但他强调得更多的却是黑格尔，洛特曼实际上从未放弃过黑格尔。洛特曼的确说过，研究和诠释古代文献的意义时将文本表现精神改变为接受者对文本的反映这一主张来源于康德，但洛特曼接着又强调说，这一主张“来源于伟大的欧洲新思想的奠基者——黑格尔和康德”。在洛特曼后几年的著作中的确出现过一些引述康德文选的思想观点，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引用康德思想在多数情况下是用于确定客观历史事实，或者是为了划清自己与康德之间的界限而做的引文。也就是说，洛特曼在后期创作中受过康德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决不等于就是康德主义学说。

巴赫金对待黑格尔哲学则从未持肯定态度。巴赫金将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视为独白性

的、抽象化的方法，将黑格尔辩证法看作是“对话的退化”（ ），认为辩证法中的个人情感、个性化特征被消除了，即“抽象的概念和论断被剥离出来，把这一切都塞进一个抽象的意识中”。^⑪他还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骗局，并说：“正题（ ）不清楚反题（ ）要取消它，而傻瓜合题（ ）不清楚自己已被取消了什么。”^⑫当然，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以及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学作品和文学体裁的方法对巴赫金不能不产生触动，但巴赫金的研究更倾向于更宏大的范畴，放眼于圣经式的“长远时间”（ ）。可见，巴赫金的理论和他的思维方式不是黑格尔式的，叶高罗夫为此把巴赫金的理论性和“大规模性的思维”称为“圣经式的”、“康德式的”。^⑬

二、不同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1. 时空论

洛特曼与巴赫金的分野还表现在他们因不同的哲学依据则产生的不同的判断体系（认识）上，譬如对时空概念的不同理解。巴赫金在认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时把时间和空间融合为一体。他在分析歌德的时间观念时总结出以下特征：不同时间（过去与现在）的融合；空间中时间的视度所具有的完整性和鲜明性；事件时间与完成这一事件地点的密不可分性；不同时间（现在和过去）之间有目共睹的重要联系；时间（存在于现在的过去和现在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创造性品格；贯穿于时间之中的、连接时间和空间、连接不同时间的那种必然性；最后，由于歌德的时间视角以贯穿着局部时间的必然性为基础，因此它还必须包括将来时间。这样，歌德笔下的形象身上就实现了时间的完整性。针对这些特征巴赫金又进一步指出，

时间及所有重要的因素都限定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他把文学中的这种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称之为“时空体”（ ）。¹⁴“时空体”这个术语源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阐释自己的文艺学思想，说明文学中时空是不可分割的：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于是时空体成了既涉及形式又涉及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时空体在文学中具有重大的体裁意义，是通过许多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小说体裁中特定类型的基础；文学形象具有时空体，语言作为形象的宝库也具有时空体的性质。所以，空间与时间在巴赫金的理论体系中相互等同。

洛特曼在研究时空问题时则认为，“空间”概念在广泛的语言形式里可以表达“时间”概念（如俄语中 一词）。洛特曼将时间视为第二性的，认为它来自于空间范畴：“表达空间关系的语言……是第一性的、基本的，而时间模式则增筑在空间语言之上，是第二性的。”¹⁵在《文化与断裂》一书中，洛特曼对立干康德的超验本体论，提出了复杂的符号空间。¹⁶洛特曼力争分析时间和空间的辩证关系，提出符号的第二模拟系统。在《在思维世界里》一书中，洛特曼又借助比利时的物理学家、化学家 普利高仁在给“行为”系统进行分类时主张个人行为不可预见性的思想，纠正了康德学说中的群体现象的可预见性这一思想。¹⁷洛特曼还指出：“……在当代符号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空间完全不同的理解……巴赫金从物理学观念出发（相对论），将空间和时间视为同一个现象（有发源于康德的可能）。而我们……则是从数学（拓扑学）角度来理解空间的：这个意义上的空间可称之为彼此间存在连续性关系的各个客体（点）的集合……从这一角度看，空间就是一种广泛的模拟语

言（ ）。试看，我们在日常交际中可以用表述空间的语言来表达时间范畴（如 ， ， 等），而用表述时间的语言表达空间概念是不可能的。”¹⁸洛特曼在后期的符号学著作里还指出：“如果我们对一个符号的空间模拟加以想像，其中的所有语言都在同一时刻产生，并处于同样的动机影响下，那么，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就不只是一个编码结构，而是诸多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系统的集合。”¹⁹由此可见，在对时间与空间的认识和判断上，洛特曼与巴赫金是大不相同的。

2. 对话论

巴赫金对结构主义持批评态度，把结构主义者视为“索绪尔的跟随者”，建立了与索绪尔静态符号系统不同的动态符号系统，创立了与过去的“独白”（ ）理论相对的“对话”（ ）学说。在写于50年代初的关于对话的笔记和文章里，巴赫金提出了对话与独白之间的对应关系，他说：“独白与对话的区别是相对的。每个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独白性（因为是一个主体的表述），而每个独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对话，因为它处于讨论或者问题的语境中。”²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主张“在一切中听到各种声音和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他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例研究多语体的作品中诸语体之间的对话，力求把自己对多语体的理解与洛特曼著作中的分析加以区别。他不赞成洛特曼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该作品，认为洛特曼把该作品的多语体性理解为一种重新编码，结果导致最重要的对话因素消失，不同语体的对话变成同一种东西不同说法的简单共存。他写道：“在有意地（自觉地）采用多语体（风格）的情况下，各语体（风格）之间总是存在着对话关系。”²¹巴赫

金批评了结构主义方法“封闭于文本之中”的“机械的范畴”，即“对立关系”、“代码更替”及一贯始终的“形式化和非人格化”。^{②②}显然，巴赫金当时还不了解洛特曼在文化历史方面的研究，也未能了解洛特曼符号学的全部思想（尤其是洛特曼在巴赫金去世后的文化符号学思想）。

针对结构主义的代码（ ）概念，巴赫金把它与语境（ ）概念相比较并指出：“语境就其潜能说是不可完成的，代码则应是可以完成的。代码只是信息的技术手段，它不具备创造性的认识意义。代码是故意设定的已僵死的语境。”^{②③}“代码要求先要有现成的内容，先要在给定的代码之间实现选择。”^{②④}

我们认为，巴赫金对代码和语境的界定本身是正确的。不过，巴赫金在这里界定的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意义，也就是说，“代码”和“语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代码是传达信息的规律的汇编，而语境则是一种巨大的文化背景，是无限深奥、纷繁复杂的联想世界。^{②⑤}所以，这两个词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巴赫金在批评结构主义时以“语境”代替“代码”一词，代码成了“僵死的语境”，这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巴赫金把洛特曼及其学派的著作（《符号体系论丛》1—4辑）与当时著名的语文学家、科学院院士 . . . 康拉德和 . . . 利哈乔夫的著作并列一起看作是当时优秀的文艺学著作，^{②⑥}但他始终对洛特曼及其学派持疏远态度，正像他常常重复的那句话一样：“我不是结构主义者。”由于巴赫金只看到洛特曼的早期创作，因此他难免把洛特曼符号学与纯粹的结构主义一概而论。事实上，洛特曼后期（尤其巴赫金去世后）已由结构主义诗学向文化符号学发展，洛特曼本人对巴赫金与索绪尔的区分就说明了这点。

“对话理论”也是洛特曼在研究中常常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他在《在思维世界里》一书中辟专章讨论“对话的机制”。他认为巴赫金的“对话”概念是宏观的、不确定的，有时甚至是隐喻性的。洛特曼从符号学角度给“对话”下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对新的、在对话关系之前尚未有的信息的加工机制。^{②⑦}“对话”意味着对称，对称首先是通过对话参与者之间的（语言）符号构造之别来表示，其次是通过交际的轮流指向来实现。后者是指对话参与者轮流从“传达”立场转向“接受”立场，因而传达是在离散的、彼此间断的情况下进行的。洛特曼以母亲哺乳婴儿时的情景为例，探讨了“母婴对话”这一机制。他指出，在“对话”机制的内部，“作为一种符号的替代形式，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还有其他联系形式。而且在各个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单位之间对话也是不可能的”，在对话过程中每个情景参与者都力争转向“他人”的话语。^{②⑧}洛特曼强调，“对话理论”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文化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如口头语言和描写语言、文学语言和戏剧语言、文学语言和电影语言相互补充的必然规律，该对话原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和代码所构成的对话交际。这样，洛特曼就从符号学范畴强调了对话的动态过程。他的新的“对话”定义也是根据这个动态公设（即新的信息产生过程）而获得动态性质的。所以，洛特曼符号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对信息进行准确的、机械的变更，而在于形成不断参与对话的新的信息。他在阐释文化的符号特性时，尤其强调了文化符号系统始终处在运动状态这个特征，认为变化是文化符号存在的规律。

洛特曼关于“对话”的阐释，表明了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对巴赫金对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洛特曼80年代的观点在某些方面

与巴赫金十分接近，看似洛特曼完全改变了自己早期的观点。其实，洛特曼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只不过在早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拓宽了自己的学说，由结构主义符号学发展为一种更广泛的符号学。我们不难看出，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符号学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三、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相通性

巴赫金具有“圣经式的”康德主义的思想观念，洛特曼具有黑格尔主义和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思想，但是，从他们两个人分析大型的材料并得出大型的结论这种方法本身来看，他们又具有相通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洛特曼在自己的研究中，的确曾运用巴赫金的许多重大发现，并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拓展。如洛特曼在分析“情节”时就依据了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和长篇小说话语的概念，他这样写道：“M. M. 巴赫金对时空体概念的引用实质性地推动了长篇小说体裁类型的研究……如果我们补充上由M. M. 巴赫金深刻分析出来的长篇小说的话语特性和涵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那么小说读者和研究者对情节的无限性的感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②9}用B. C. 瓦赫鲁舍夫评论洛特曼的《在思维世界里》一书的话说，“当洛特曼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的多相语言的复杂多声的特点、各个对话系统的离散性等问题时，作者常常跑到巴赫金的领域上来。”^{③0}洛特曼自己也指出：“一种文化必然具有两种以上的语言符号这个思想，就直接来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③1}

两位学者还具有许多在结构框架上极为相似的观点，如两位学者都将本体与功能相对立。波兰文化学家鲍·日勒克就对巴赫金的“体裁”、“长远时间”和洛特曼的“象征”（符号）概念作过比较。^{③2}洛特曼在《文

化与断裂》一书中也建议，要运用巴赫金的理论分析O. M. 弗列依德别尔格的方法与他对体裁和情节的研究。^{③3}洛特曼在研究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时，就拿梯尼亚诺夫与巴赫金进行过比较，发现梯尼亚诺夫的某些科学思想很像巴赫金。洛特曼写道：“就像尽管文学史对拉伯雷的再现不是无懈可击、但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理论思想却是深刻而卓有成效的一样，梯尼亚诺夫的《普希金和丘特切夫》一文的意义也完全不在于对普希金和丘特切夫之间关系的研究上。”^{③4}

除了相通性外，洛特曼对巴赫金的理论也做过更确切的说明。比如针对巴赫金把“独白—对话”这一对对立概念运用在“诗和散文”的体裁研究中的情况，洛特曼认为不仅在文学种类之间，而且在艺术方法上都存在“独白与对话”的对立，如对话式的巴洛克和独白式浪漫主义无论在诗歌里还是在散文里都能遇到。^{③5}

当然两位学者最相似的还是他们的道德标准。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身体力行方面，基督的道德原则始终支配着巴赫金多难的一生，他从未背叛过自己的道德观念。洛特曼虽然不曾像巴赫金那样被逮捕、被流放，却也经受过四年的战争以及饱经压制和恐吓的岁月，他也从未放弃过崇高的道德原则。更主要的是，二人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创作思想上都体现出深厚的民主思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是从地位平等的参与者的角度出发推断得出的，洛特曼的文化思想也是极其客观的、富有民主精神的。二者所有创作上的追求都是诚实的，都可谓对真理的追求。

洛特曼说过：“与M. M. 巴赫金个人有幸结识的人，都能确信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研究者，也是一位有着崇高人格、杰出职业道德并执着追求真理的学者。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说我们如何来看巴赫金，而且应该

说巴赫金如何看我们，我真希望我们的科学志向不辜负他。^⑳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坚定地用这些话来评价洛特曼。

. Bc. , M. M. , // . , 1996, No. 3, C. 5 - 58.

. 1990, . 1994, . 1996, . 1997 . 参见 . , 1999, C. 244.

. // . 1, C. 240 - 259.

⑬⑮⑲⑳㉑㉒㉓㉔ . . . , M. , 1999, C. 245, 252, 248, 246, 254, 255.

. : , . // . 1, M. , 1990, C. 25.

⑳㉑㉒㉓㉔ 《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0 - 510、519 - 520、191、315、391 - 392、413、397页。

B. . . . , M. , 1996, C. 35 - 36, 39 - 40, 230.

. // . 1, C. 216.

. : C . M. . // . M. O . , 1998, C. 678.

⑪⑲ “ ” 1970, No. 11. // . . . , M. , 1979, C. 352, 364; 330.

⑫ . // . , 1993, No. 2, C. 72, 88.

⑬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7 - 275页。

⑮⑲ . . . , O . . . - : . . . - , 1997, C. 658.

⑯⑳ . . . , M. , 1992, C. 42 - 43, 217 - 218.

⑰ . . . , M. , 1996, C. 326 - 327.

⑱ 15 1983 . // . . . , C. 270.

⑲⑳ . . . , C . . . : . . . , 2000, C. 252, 268.

⑳㉑ . . . , P 《 》 , T . , 1975, C. 33, 33.

㉒ . . . , n uno ui, C . . . , 1996, C. 567.

[作者简介] 赵晓彬，1963年生，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研究生导师，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俄罗斯文学的装饰风格初探》、《果戈理作品中的“物”的表象问题》等。

责任编辑：萧 莎